

中国对外投资趋势:集中五大行业 央企占比下降



■ 耿雁冰 张梦洁 报道

中国吸引外资(FDI)和对外投资基本平衡,甚至在未来的某个节点,后者超越前者形成资本净输出格局,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常态”。

“利用外资规模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即将迎来双向投资的首次平衡。”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2014年商务部党组扩大会议上表示,2015年主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一大措施,就包括构建“引进来”和“走出去”基本平衡的投资促进体系。

从日前召开的全国商务工作会议透露出的信息来看,2014年对外投资有望与吸收外资持平,中国或改变过去20多年来作为全球主要FDI目的国的角色,变身成为全球FDI的重要来源国。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此前发布的《2014世界投资报告》也预测,发展中经济体吸引FDI拐点将至,其中FDI最大目的地——中国——可能最快在2014年由FDI净流入国转为FDI净流出国。

基于此,这种趋势性变化的背后,中国吸引外资、对外投资有哪些新趋势?从中透露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哪些变化?

1.中国将成资本净输出国

在FDI规模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的同时,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增长1.4%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

观察最新数据可以看出,2014年对外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非常接近,而且商务部一般统计的对外投资增长数字只是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

2013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是802.4亿、1055.06亿美元,两者相差252.66亿美元。而2014年同期,这两项数据分别是898亿、1062.4亿美元,两者相差164.4亿美元,差额较同期缩减了88.26亿美元,将近54%的幅度。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境内投

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两者相差274.16亿美元。

目前,2014年全年数据尚未发布。而若拉长时段,对比FDI、对外投资的话,2003-2013年,FDI年均增速为7.92%;与FDI增长情况相比,对外投资(非金融类)规模扩张迅速,年均增速为45.42%,这一增速约是FDI的6倍。

2003年,中国FDI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值为506.55亿美元;2013年,这一差值已缩小至274.16亿美元。11年间两者差距消减近一半。由此可见中国“走出去”的速度,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指日可待。

2.超过八成 FDI 来自亚洲

十六大以来,中国吸收利用外资已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规模和质量得以全面提升。

FDI的质量效益具体表现在利用外资的结构方面。

一方面,在外资来源方面,来自亚洲地区的外资规模稳步提升。亚洲外商直接投资由2004年的占62.10%提高至2013年的80.51%,而来自北美、欧洲的外商投资则则由2004年的16.12%,下降至2013年的9.3%。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亚洲地区将是中国今后对外开放的重要区域。

其次,在外资利用的产业结构上,同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相同步,服务业利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2013年就是临界点,当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首次占比过半,规模为61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5%,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52.3%。

再进一步细分FDI行业利用规模和增速的话,可以发现,2013年利用外资规模过百亿美元的行业中在四大行业,占总规模的81.83%,依次是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这四大行业的分化也已经开始显现。制造业FDI不仅增速出现负增长,而且其比重由2006年的63.59%下降至2013年的38.74%;相较而言,其余的三大行业房地产、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比都在提高,而且增速表现也相对稳定。其中,房地产业

FDI占比增长最快,由2006年的13.06%提高至2013年的24.49%。

此外,在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上,基数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不过,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2.4%和17.6%。

3. 对外直接投资向五大行业集中

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6604.8亿美元,较上年排名前进两位,位居全球第11位;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地区),较上年增加5个。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出行业、目的地集中与投资主体、方式分散相交织的趋势。

第一,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来看,投向广泛,集中趋势更加明显。2012年,投资过百亿美元的行业中主要集中在七个行业,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92.4%;到2013年,投资则进一步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五大行业中,累计投资存量达5486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3%,当年流量占比也超过八成。

不过,这五大主要行业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这一指标来看,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在提高;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则有所降低。

第二,投资方式逐渐多样化,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有统计记录的2003年,以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占18%,股本投资14%,利润再投资35%,其他投资33%;2012年,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金额434亿美元,两者均创当时的历史之最。其中,直接投资276亿美元,占63.6%,境外融资158亿美元,占36.4%。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地方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身影增多,改变了以前主要靠央企、国企“走出去”的局面。在2003年,中央管理的企业拥有对外投资存量的九成以上。如今,对外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地方企业、非国有企业话语权也在增强。

一方面,地方企业对外投资稳步增长,2013年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

量为1649亿美元,占比达到30.3%;在流量上,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364.15亿美元,占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9.3%,其中,广东、山东、北京位列前三。

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占比不断扩大。截至2013年底,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434亿美元存量中,国有企业占55.2%,非国有企业占比44.8%,较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2013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27.4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占43.9%;有限责任公司占42.2%,股份有限公司占6.2%,股份合作企业占2.2%,私营企业占2%,外商投资企业占1.3%,其他占2.2%。

4.从“制造大国”到“资本大国”

引进外资、对外投资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分工过程,天平逆转的背后,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化。

一方面,中国利用外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要素优势在减弱,相应提高了外资企业生产成本,尤其是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弱化。据学者研究,中国制造业相对美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将由2010年的20%下降到2015年的11%,波士顿咨询公司(BCG)预测,到2015年美国的制造业成本比中国长三角地区只高大约5%。

同时,中国劳动力优势也不敌其他发展中国家。BCG称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经高于其它出口大国,目前越南的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一半。人社部数据也显示,2014年19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在14.1%。

另一方面,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也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资本大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必要所在。

经济学家马光远就认为,一国经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

贸易增加值,能客观反映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和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利益分配。根据商务部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2012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14335.8亿美元,仅占当年GDP的17.4%左右。

而资本投资所带动的增加值反映在GDP上的效益则要更加明显。事实上,综观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进程,其实就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前期货物贸易和吸收外资是主渠道,后期“走出去”、服务贸易逐步发力,参与全球价值链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体量仍偏低,但实现资本参与国际分工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尽管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对外投资大国,但就对外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并不高,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为6600多亿美元,全球排名11,占全球存量的比重只有2.5%,对外投资存量只有美国的10%,日本的一半。

中国开启第三方治污之路:谁污染 谁付费

■ 秦菲菲 报道

“谁污染、谁治理”的老路将向“谁污染、谁付费”转变。

国务院办公厅14日发布了《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从完善价格和收费政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发展环保资本市场多方面给予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支持。

第三方治理“一举多得”

近年来,我国多地区遭遇大范围、长时间雾霾天气,部分城市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局部地区土壤污染程度加剧。这些现象在引发全社会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的同时,也让公众充满困惑,为什么在环保成为基本国策,并且投入逐年增加之下,环境形势却依然严峻。

“不少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闲置不用或间歇使用,形同虚设,完全实现不了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要求。”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坦言,目前我国工业治污依然沿用“谁污染、谁治理”的老路,由排污企业自行解决治理问题。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工业企业自觉控污减排意识比较淡薄。同时,受经济实力和水平制约,也很难做到每个企业都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建成后也常常出现建而不运、运而不足的现象。

“缺技术”、“投入大”、“监管弱”,环境改善自然难见成效。因此,在环境治理领域采用市场化手段,被认为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治污之路。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在环境建设方面,政府更应该考虑如何让经济手段为环境改善多做贡献。

贾康说,如果较多采用行政手段,政府并没有能力做到对海量企业有效甄别“关停并转”,以准入为代表的法律手段也会导致寻租层出不穷;依靠经济手段调节,让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才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据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

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对记者说,第三方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排污企业由于采用专业化治理降低了治理成本,提高了达标排放率;政府执法部门由于监管对象集中可控而降低了执法成本;此外,还刺激了环保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可谓一举三得。”

近些年来,工业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已经在我国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领域得到试行,取得显著成效。一些大型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也尝试着采用此种模式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如燕山石化委托威立雅水务处理企业工业废水、上海化工园区委托中法水务处理园区工业废水,都取得良好效果。

“已经有一些工业企业、县镇企业的污水处理委托我们企业来做。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桑德环境董事长文一波此前也表示,我们在技术、设备、问题处理方面比非专业公司强,由于业主和政府对环保企业的监督,环保企业的重视是空前的。经济上,双方也都是受益的。

“一揽子”措施力挺

为了更广泛、有效地推行第三方治理,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从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场,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持等方面鼓励和支持环境治理第三方治理的发展。

《意见》提出,到2020年,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重点领域第三方治理取得显著进展,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社会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的活力进一步激发。环境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体制改革基本完成,高效、优质、可持续的环境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第三方治理业态和模式趋于成熟,涌现一批技术能力强、运营管理水平高、综合信用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境服务公司。

根据《意见》,要推动环境公用设施管理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模式转变,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形成权责明确、制约有效、管理专业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对可经营性好的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采取特许经营、委托运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通过资产租赁、转让产权、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

在政策支持方面,《意见》从完善价格和收费政策、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发展环保资本市场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具体包括,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治理项目给予中央资金支持,有条件的地区也要对第三方治理项目投资和运营给予补贴或奖励;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节能环保信贷资产证券化,研究推进能效贷款、绿色金融租赁、碳金融产品、节能减排收益权和排污权质押融资;对国家鼓励发展的第三方治理重大项目,在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还贷条件等方面给予优惠;对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治理企业,上市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实行优先审批。

二孩放开或在“十三五” 专家建议先试点

■ 定军 孙倩 报道

近期,2014年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将公布。没有意外的话,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还将延续前两年的下降趋势,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步伐也有望加快。2012和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上一年下降了345万、244万。

承担国家发改委“十三五”人口政策课题研究的专家,湘潭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刘长庚告诉记者,鉴于符合条件的“单独二孩”生育意愿低于预期,建议加快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步伐。

刘长庚与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湘潭市“普遍允许二孩软着陆”生育意愿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湘潭市“普遍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是很强烈,主要原因在于成本太高,负担不起。据数据测算,现阶段若放开“普遍二孩”,并不会造成人口扎堆现象。上述调查报告是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人口政策研究项目的内容之一。

单独二孩政策从2014年3月份开始陆续启动实施,国家卫计委2015年1月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大概有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了申请。目前新增出生人口低于官方预测。

刘长庚1月13日对记者表示,建议尽快试点,然后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此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经济蓝皮书:2015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也撰文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过渡。

期待“十三五”实现全面放开

地方卫计委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单独二孩生育意愿比预期要低。

根据北京卫生部门1月12日发布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0日,北京共收到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30305例,审批28778例。

目前,北京每月申请生育二孩的家庭在2000-3000例之间,基本趋于稳定,申请对象集中于26-40岁育龄群体,占总申请量的97%,41岁以上人群仅占2.5%左右。

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之初,北京预期每年将新增5万出生人口,而实际情况显然相去甚远。

北京市人口研究所研究员马小红估算,北京市因单独二孩政策实际新增出生人口数大约1万多,这在北京每年的新增出生人口中的占比是比较少的。

在北京市新增出生人口的高峰期,每年大概增加五六万人,近几年一直控制在十一万人的水平。“考虑到单独子女家庭承担的风险较大,可能会出现失独家庭,我认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越早越好。”马小红说。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金营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目前实际申请单独二孩的情况看,预计“十三五”后半期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实际生育意愿比较低。与单独二孩由各地自主实施类似,届时全面放开二孩也可能由各地自主实施。

生育意愿地方差异大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在2015年就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刘长庚表示,目前符合单独二孩生育条件的家庭普遍再生育的意愿不强,主要原因在于成本太高,负担不起。

据刘长庚的课题组测算,现阶段若放开“普遍二孩”,并不会造成人口扎堆现象。刘长庚建议,“在全国范围先找几个县市试点,看情况如何。然后可以考虑推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湖北人口学会副秘书长石智雷表示,各地生育二孩的意愿有差异。目前,湖北省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人群中只有21.5%的人明确会申请。而50%左右的符合条件的人表示因为经济压力过大,不要二胎。其次就是无人照顾孩子等原因。类似的还有四川、重庆等地,单独二孩申请率较低。但对江西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符合条件的家庭,有再生二胎的意愿,而且实际申请率也较高。

